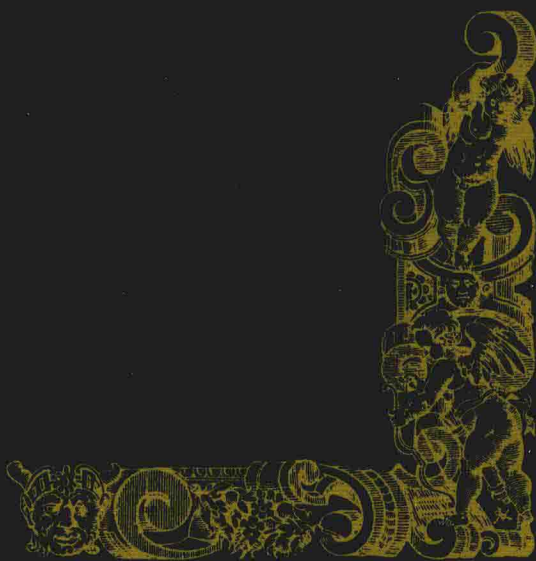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 与新世纪文化建设

季 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 与新世纪文化建设

季 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季玢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3

ISBN 978-7-5426-5438-0

I. ①中… II. ①季…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当代②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I207.99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0064 号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

著 者 / 季 玢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1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38-0/I · 1100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序 言

关注与阐释当代文学中人的悖论

杨剑龙

倘若以花作喻,季玢女士不像玉兰花不长叶便匆匆开花,那么哗众取宠急不可待;也不像牡丹花雍容富贵堂皇富丽,那么压倒群芳不可一世。季玢女士像野地里的百合花,在野地里深深扎根、汲取雨露,不张扬,不喧嚣,不傲慢,不急躁,在野地里悄悄地含苞、悄悄地绽放,为这个世界增添美丽和馨香。季玢女士 2003—2006 年在苏州大学攻读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以《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题,201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从文学类型的角度分别研究中国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并探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导师朱栋霖教授在序言中说:“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以丰富的、实在的作家与文本资料确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存在。”对于其博士学位论文予以充分的肯定。

2010 年,季玢女士进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我是她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她的出站报告为《人学视野中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1978—2010 年)》,该著就是其在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润色

的成果。倘若要评说该著的特点,我想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方面:人的悖论的独特视角、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式、文化建设的深刻立意,形成了该著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

人们认为:“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处境以及人的归宿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文学所特别关注的。而人的存在本身,正是人类可能遇到的最大的悖论……人类本质的悖论、人类处境的悖论和人类归宿的悖论不仅在基督教经典中贯穿始终,而且也在西方文学中激荡着久远的回声。”(杨慧林等主编《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2 页。)季玢教授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延续了其博士论文的视阈,立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梳理与研究中,在主题学的分析与评说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作家作品,在对于母爱书写、性爱书写、死亡书写、自然书写、文革书写等方面的梳理探究中,其实是探究了与人的本质、处境、归宿相关的人的悖论,构成了该著人的悖论的独特视角。在探究死亡书写时,她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主要通过融汇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和基督教的文化精神,透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对困境中的人类进行终极关怀,寻找了解释死亡之迷、建构精神家园的哲学根底……;在探究自然书写时,她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神性解释,从神意之美中寻觅终极的源泉,架起了重返自然乐园和复归本真人性的诗意桥梁。这些深入肯綮的分析,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观照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该著从人的悖论的独特视角展开研究的独创性。

在该著中,著者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分为三类:文化精神研究范式、文学本体研究范式和宗教信仰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说该著主要采取文学本体研究的范式,通过对于大量文学文本的梳理与分析,从而细致深入地探究了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独特内涵。

“五四”以来,由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历史语境,由于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与推崇,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诸多作家与作品中呈现出十分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对于西方宗教的敌视态度,形成长时期的谈教色变的非正常现象,作家和文学创作逐渐远离了宗教。新时期后,在逐渐正常化的社会发展中,宗教又获得了肯定和重视,一些作家、诗人皈依了宗教,不少文学作品中又呈现出或浓或淡的基督教色彩,中国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论题也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季玢女士是较早系统地展开此方面研究的学者。该著涉及了众多的当代作家和作品,不仅涉及了北村、史铁生、礼平、乔叶、范学德、范稳、吴尔芬、傅翔、书拉密、陈卫珍、殷颖、华姿、沙光等作家,还分析了台港作家张晓风、杏林子、苏恩佩等的作品,探究了海外华文作家王鼎钧、施玮、莫非、姚张心洁、丹羽等的创作,梳理了诗人海子、宁子、空夏、鲁西西、苇岸、胡燕青、齐宏伟等的诗作,该著在梳理分析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当代作家作品中,为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视阈奠定了基础。

在该论题的构想时,著者努力与当下的文化发展与建设接轨,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与新世纪文化建设勾连起来,虽然有刻意贴近时代之嫌,却也形成该著的一种特点。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将宗教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他指出追踪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心里作用,“它是去理解人们关于‘真正现实’的观念(无论多么含蓄)以及这种观念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怎样影响人们对理性的、实践的、人道的和道德的东西的常识”(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宗教与意识形态》,龚方震、陈耀庭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宗教必定对于文化建设产生某种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季玢力图“从20世纪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格局着眼,在充分考虑文化和社

会转型的语境下,以汉语批评作为理论视角,可以挖掘出当代文化建构深层次的价值源泉”。她将中国基督教文学视为当代文化建设过程的一部分,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书写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竭力探讨了当代人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如性爱难题、母爱精神、死亡恐惧、自然生态以及文革创伤等,发出了对宇宙奥秘、自然奥秘、生命奥秘的永恒之问,这是人的存在真谛和人的生命意义的诗性见证,从而对‘文学是人学’作出新的阐释,显示了此命题深广的涵盖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丰富了中国人学精神内涵,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路径。”并且提出“基督教文学作家理应面对当下、透视当下、引领当下;基督教文学作品应当以自己的足迹呈现道路,以自己的生命呈现生命之光,从而为新的人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建设开拓视野、提供思路、创造思想”。这不仅是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精辟总结,也是对于当代作家创作的深情呼唤。

2008年10月11日,我在主办“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时邀请了已在此方面有研究的季玢女士,她撰写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困境与应答》一文与会,这是我们的初次面识,她是一位不善言谈偏于内向的女学者,后来我将会议论文编辑成《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一著,2009年2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0年季玢进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我推荐她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暑期班学习,我曾经在神学院任客座教授,我知道这对于季玢的拓展视野、结识学者、搜集资料会有帮助,该著的完成明显也有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裨益。

季玢的“玢”有玉的纹理、将玉分开之意,延伸开来便有切割琢磨之意,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切割与琢磨。季玢本名季小兵,“小兵”非大将,是冲锋陷阵的,但是在中国象棋中小卒子过河成大器,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虽然有勇往直前、有进无退、难以回头之

意,现在的季小兵其实早已过河,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大将了。

虽然,我对于季玢在其博士论文和该著中提出的“基督教文学”概念有所保留,但是我对于她所取得的成就是真诚赞赏和由衷祝贺的。

季玢这棵野地里的百合花依然顽强地生长着,希望她的根扎得更深、花开得更艳、香飘得更远,为文学研究奉献更多更好的成就。

杨剑龙

2015年9月24日

于瞻雨斋



目 录

序言 关注与阐释当代文学中人的悖论	杨剑龙
引 言	1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1
二、中国基督教文学与文化建设	20
第一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母爱书写	39
一、百年文学的母爱书写模式	39
二、母爱内涵的宗教文化精神	63
三、“爱”与幸福的生命教育	75
第二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性爱书写	84
一、性爱书写的焦虑形态	86
二、性爱书写的审悲观照	96
三、孤独: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本	124
第三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死亡书写	138
一、“生命是一场奔丧”	140
二、疾病隐喻与死亡书写	145
三、爱:生命的牵引力	164
第四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自然书写	178
一、建构神性自然观	180

二、自然：人类灵魂的镜子	203
三、诗性与神性解释学	215
第五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文革书写	231
一、新时期文学文革镜像之反思	232
二、文革记忆的神学伦理学解读	244
三、文革书写的文化建设命意	276
第六章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人学精神的文化启示	297
一、集体的“民”与个体的“人”	300
二、“我一你”关系中的“人”	311
结 语 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审美之思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38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论的流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成为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这种简单的“文化侵略”定位模式逐步被打破,求真求实的学术理念渐次回归,多元多维的理论资源竞相引进,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之研究开始成长为一个开放性的、甚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从1978年以来,学术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①,1990年代以来涉及到本研究领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有130

① 影响较大的有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和梁刚译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勇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谭桂林、龚敏律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岳麓书社出版社2006年版)、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陈伟华的 (转下页)

余篇,诸多学术期刊设置专栏进行系统的学术探讨与争鸣,比如《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设置“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专栏,《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设置“中国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笔谈)”专栏,《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设置“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专栏等等。

人类的学术活动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和演变,总会逐渐形成特定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并非学术发展活力的障碍,相反作为一种观照角度、思维工具、解读方式和批评策略,它是学术活力的直接前提条件之一,若非如此学术研究就会陷入紊乱失序的窘境之中。新时期以来的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只是经历了三十余年,但仔细梳理其缤纷多彩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已然存在的三种研究范式,即文化精神研究范式、文学本体研究范式和宗教信仰研究范式。虽然这三种研究范式往往共时存在,但仍然存在着一历时的发展历程,不仅标志着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从所谓的“外在”向“内在”的突进努力,从“边缘”打转到“中心”阐释的递嬗转换,而且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的观念变化。以下试以三种研究范式为基本思路,对新时期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作梳理阐释。

(一) 文化精神研究范式

文化精神研究范式关注的是中国作家如何在“拿来主义”心态的驱使下,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适时所需的精神资源来沉思中国

(接上页)《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杨剑龙等的《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版)、丛新强的《基督教文化与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社会文化的命运,探究基督教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范式是进入 1980 年代以后学术界因试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解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疑惑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的具体产物。

文化精神研究范式萌发于美国学者路易斯·罗宾逊 1986 年撰写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作者在《导言》中指出:“中国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参照耶稣的行为标准来指出基督教行为的矛盾,并进而指出基督教自身的矛盾。这一创作方法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①这部作品虽然“仍然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假象的迷惑”,但是还是“敏感地抓住了这些反基督教的作品里同时包含了对自身文化环境的批判”^②,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研究。文化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分析方法即荣格心理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使得此书成为本研究领域的一块厚实基石。

“文化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文化的灵魂。发表于 1992 年第 2 期《文学评论》的杨剑龙论文《论“五四”小说的基督精神》试图通过阐释基督教的牺牲、宽恕和博爱三种文化精神对五四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探究基督教文化精神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以纠正 1980 年代仍然残存的“文化侵略”定位思想的偏颇。这种“文化契合论”在杨剑龙 1998 年出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得到充分的阐释和有效的张扬。该书爬罗剔抉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訏、

① [美国]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傅光明、梁刚译,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 页。

② 陈思和:《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北村、张晓风等 15 位作家的文献资料,“着眼点不在中国作家如何反对基督教,而是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同’基督教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在自己身上的文化传统因子中发现基督精神的无所不在。”^①“《两刃之剑》所没有深入探讨的,被杨剑龙先生接过来认真阐发了……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②。“文化契合论”是在特殊情势下突破以往研究偏颇的一个智慧的策略,意在矫“文化侵略”定位模式之偏枉,它在使基督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常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但是著者似乎因过分急切地想纠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复杂性,正如有的学者在评价《旷野的呼声》时所言:“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常常是在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折冲。”^③

“文化契合论”往往采用“索隐法”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从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虽然常常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新意迭出,但同时也存在着将这种方法静止化、功利化的倾向,“竭力从作家的个人经历、文本中寻找一切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线索,并往往放大这些线索对创作者的影响力。他们一般不重视这些线索具体的内容与历史背景,而乐于通过索隐的方式来证明这些线索总是隐秘地见证了作家基督徒式的感情”^④,以所谓“修补翻新”的研究心态造成了对

① 陈思和:《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 3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陈思和:《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 2—5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德明:《基督教究竟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什么——评杨剑龙著〈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 年第 4 期。

④ 马奇佳:《遇到异乡的神邸——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作家及其创作的过度阐释,甚至极度歪曲。过度阐释是学术研究中的超语境批评现象,真正的学术研究强调的是深度阐释,而不是过度阐释。

如果说《两刃之剑》注重反基督教、《旷野的呼声》聚焦认同基督教,那么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则侧重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矛盾心态,作者在著作提要中说:“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作家对在特定时刻以特定角色进入他们视域的基督宗教文化不得不采取了半推半就、欲迎又避的矛盾态势,因而,较之对其他西方的文化形态、哲学思潮,他们在面对基督宗教文化时的接受心态、应答方式就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他们强烈地需要基督宗教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却竭力回避或否定它的物质形式和某些教义信条,他们始终没能像拥抱希腊文化那样热情不衰地接待基督宗教。……尽管中国现代作家也曾热烈地礼赞过基督文化这轮‘幻想的太阳’,热切地呼唤过基督和基督精神,并站在神圣崇高的位置,替自己和整个民族忏悔,但他们更经历了信仰和反信仰的曲折反复。同时,由于严峻冷酷、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他们无力也无法持守纯粹的理想情状,他们始终未能走出十字架的阴影,将现代文学引向神圣的伊甸园,导致了现代文学缺乏内在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持久美学意味的结局。”^①此观点颇有见地,将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推进了一步,但该书在各个章节的设置和具体内容的阐述方面仍然存在着将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微妙的心态简单化为“认同”与“不认同”所谓“双刃”的嫌疑,对造成作家复杂微妙心态的一些关键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作深入探究。

^①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两类文化思潮:“显”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极力提倡的西方文化,“隐”的是以惯性力量自然过渡、潜伏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两股力量相互冲突、相互缠绕,才形成摇曳多姿、复杂多元的文学景观。诚如王本朝在《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书中所形象比喻的:“基督教就好比是一小石块,在它抛入中国文学的河水里,必然会引起一圈圈或大或小的涟漪,‘涟漪’和‘石头’之间构成的关联和张力则是问题的关键。”^①阐释和描述“涟漪”与“石头”之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该书研究的指归。该书在新时期以来的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形成中具有“突破”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将基督教与中国作家的时段从现代延伸至当代,展示了其打破了以往研究仅限于基督教与中国作家个体之间的对应思维模式,而从历史意义、精神遇合、叙述方式对基督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审视的学术魄力和微观阐释的精细高妙,尤其上编“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意义”深入地论述了近现代教会学校、留学生制度、西学译著以及《圣经》读物作为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存在价值,视野宏大,立意高远。更在于著者在思考基督教文化时是立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如果以基督教的基本问题为立足点考察中国文学,就会出现价值偏差,也难以发现多少真诚而纯正的宗教文学。中国文学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需求处理、表现基督教的,所有的‘文学表现’意义不在表现的容量和成分,而在于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基督教文化的进入中国文学显然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封闭性,诱使或激活中国文学对世俗与终极、批判与超越、自我与世界、身体与精神等有了复

^①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 3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杂的关注和回应”^①，使宏观审视跨文化和微观阐释自身文学以整合外来文化成为一种可能。文化整合是包含着主体个人意志的主观行为，语言的整合是文化整合的一种重要表征。王著的下编“基督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正是从语言层面来深刻剖析了《圣经》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之关系，显示了其进行文化整合研究的努力和尝试。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应和着学术界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从“反对论”、“契合论”、“矛盾论”到“整合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也开始确立起来。这种范式以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关怀现实的品格以及多元开放的对话，解构了传统的纯文学本体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激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停滞的局面，取得一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这种由“自律”走向“他律”的研究范式所存在着文化研究过度活跃而文学的本体研究惨遭放逐的尴尬同样也渗透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学术领域：“大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分析为主，而较少作文学本体的深入研究与探析，在关注文化层面的问题时常常忽略了文学层面的问题”^②。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③

①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 336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杨剑龙：《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

③ [美国]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千永昌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 13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